

启明文丛

知识人的黄昏



「美」傅铿 著



启明文丛

知识人的黄昏

〔美〕傅铿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人的黄昏/(美) 傅铿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

ISBN 978-7-108-04225-5

I. ①知… II. ①傅…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6390号



策划编辑 刘 靖

责任编辑 李静韬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9.7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36.00元

序 言

李天纲

傅铿，你一定还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流行的那本《流放者的归来》(*Exile's Return*) 吧？就是上外版的，美国文学史“迷惘的一代”分子马尔科姆·考利写的，写 20 世纪 20 年代海明威那一批人离开纽约，去巴黎闯荡……他们自称“流放者”，说“在这个伪善而压制人的国家里，年轻人没有前途。他应该乘船到欧洲去，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一直留着这本书，找到这句画过线的话，内中仍有一颤，于是抄了出来，引我们回到过去。

你是 1992 年离开的，去美国纽约上州一所好学校留学。以后我们重逢，在纽约、新泽西、或者上海，你都是怀着感叹，提到去国前后人生转折的故事。那个时代，有相似经历的人很多。我比你早一点，从上海社科院的另一个所，去了旧金山的一所小大学。做完了访问，一年多就回来，再作冯妇。于是，此前的经历很相似，此后的命运就不同。对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再也不能蹉跎的岁月，最终的梦想破灭后，只有一条路：“乘桴浮于海”——出国去。无论如何，你的去国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 30 年的经历，就没有你现在的状态以及心态，还有这一本上了台阶，含着更深关怀的《知识人的黄昏》。

最近 10 多年来，每次重逢，大家都欣赏你的良好状态。在热闹的纽约上大公司的班，与宁静的普林斯顿校园为邻过日子。你自嘲是“边缘人”、“洋插队”，在谋生职业和兴趣学业之间游离，言语之间存着遗憾。但是，谈起知识界的事情，我们没有感到你的离开。相反，在纽约和普林斯顿的生活阅历提升了你的境界。听你讲在公司里和印度籍、犹太裔同事的讨论，我很受益。谈论“多元文化”，不但需要读书，还需要生活体验，这方面你有了很多可说，可惜还没有写在书里。现在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阅历 So So，观点拼凑，境界更是不够。反正你也知道这类例子，就不说了。最近 20 年里，中国维持“开放”，上海也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世界化”。但就国内人喜欢说的“时代精神”而言，纽约、巴黎，仍然是策源地，上海仍在边缘。正如《流放者的归来》书中所说：“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我都不知道，今天上海还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那个“生活”。对今天的中国人，还要专门加一句说：“生活”，不单单是一本收支账，还包含了文化、艺术、思想和信仰。

在你的书中，有一篇“巴黎怀旧”，赞美巴黎的文化底蕴，我很喜欢读。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在《书城》杂志上也写了一点巴黎观感，朋友抓到痒处地揶揄说：在美国待得还久一点，却喜欢蜻蜓点水地谈巴黎。没有办法，连海明威这样的本籍芝加哥人，连你这样的美籍上海人，也都是喜欢巴黎的“懂生活”、“有文化”，何况困在“东方巴黎”的我们。巴黎，或许是知识人的终极流放地，是一座真正有精神的城市。朋友不会单单带你去有故事的餐馆，还会领你去看画廊、听讲座。当时就这样在巴黎恭逢了哈贝马斯、德里达、谢和耐、张广达……如果纽约是 20 世纪的

“世界之都”，那么巴黎在 19 世纪就已经是“欧洲之都”了。据我的经验，欧美的文化学术界，都对巴黎的文化充满敬意。“美人之美”，是多么好的事情，不似这里几个驻法记者，老是在通讯中诅咒欧洲文化。

1998 年底，我从波士顿去纽约，在你家中过圣诞节，谈到美国文化的开放性，愉快畅谈，此生难忘。美国早期居民质朴、虔诚、固执，和欧洲拉丁民族的奔放、奢华、随性很不相同，“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没有死死抱住自己的“清教主义”，或者不列颠的 WASP 精神，而是把欧洲文明整体吸收进来，成了“西方”的继承者。先是法国、德国，后来是意大利、西班牙，天主教各民族的文化都融入了。现在轮到消化非洲、日本、中国、印度族裔的文化了，虽然步履维艰，但已堪称“多元”。你用自己的经历，谈到“文化融合”之不易，但却坚定地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很佩服。看到身边有很多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因为不适应美国生活，陷入“民族主义”情绪泥潭。那个时候，在纽约、在波士顿，我们都已经初闻亨廷顿的右翼“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左翼“王道论”，还有查尔斯·泰勒、孔汉斯从欧洲赶来，用“社群主义”、“全球伦理”来驳斥亨廷顿的“保守主义”。和你一起谈这些问题，很容易深入下去，你的阅历和理性，给了很多谈助。我们说“保守主义”对美国丧失主体精神深表忧虑，但美国不是在“开放”中发展和更新着自己的主体精神吗？对于当前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们当然可以有所不满，但是真的让美国回去 3K 党时代，欧洲倒退到单一文明，中国也仍然自大或者自卑地封闭自己的帝国，拒斥“番鬼”，然后“冲突”，那这个地球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世上凡稍大一点的问题，在自己的文化里面就看不清楚，尤其是当该文化处于专断和封闭的时期。精神的成长，需要心灵的流放，思想者需要有不同文化的经历，这已经是被古今中外大量文化运动证明的铁律。犹太人的“diaspora”，在埃及、巴比伦，以及在欧洲各地的流放，才使希伯来文化确立起来。罗马也是通过学习希腊，才把古代地中海文明推向高峰。更不用说中国人的文化，自古便是在不同地域文明的交互关系中发展的。“开放”这一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曾具有广泛的共识，所以才“出国”、才“流放”。既然是“流放”，当然就会饱含悲伤，克服它才能成长。然而，这样的态度，今天却被很多人轻视。很多人在国外，甚至在国内，怎么就自我封闭起来。他们会把和异民族人群的利益分歧，都直接迁怒到生活中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攻击别人的文化。这里讲“文化保守主义”的教授，说胃口只为中餐生，看见西餐就反胃。居然还有核心层的干部说，“我们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好像回到了清朝。

我们应该不是属于那种“盲目崇拜”吧？30年过后，我们这一代人对“西方”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些年来，你对美国社会弊病的分析，我都很佩服地倾听。不单是你，我们的那些朋友，欧美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都告诫中国学者不要无限赞美美国制度，现在的美国，有很大的问题。每次听到这样的忠告，我都惕然警觉，肃然起敬。我的态度是这样：首先，美国社会的问题，最好让美国知识分子自己去批评，他们更负责任，更有办法；其次，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的负责精神，而不是他们对“中国经验”的热情想象，才是中国同行最应该认真对待的。理由很简单，生活在世界两端的学者们，都要对自己生活的那个社会

负责任，赞美对方要适度，都不要对“他者”做过度的想象。说实在的，我认为某些西方左翼人士对“中国模式”的热情，多少是不负责任的；而不少大陆学者在内地院校里用萨义德的理论骂西方，看似附和了欧美左翼观点，事实上反而变成了东西方文化相互攻讦的“民族主义”形态的右派话语。

例外的是，我完全能够接受你在“美国民主的除魅”一文中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很明显那不是国内“左派”的学舌腔调，而是一种有切肤之痛的理性经验，我觉得这一篇是你所有文章中说理最透彻的一篇。你对“美国民主”的分析，是在美国社会内部进行的。即使是一个外国人，在当地生活了20年，对那里的文化有兴趣、有好奇，当然有资格进行“内部分析”。我喜欢的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在明朝住了30多年，融入中国，他对儒教的评论，就是带着比较，进入“内部分析”。其实，你不但有20年美国生活的感性经验，而且还运用了诸如普林斯顿大学沃林教授的理性分析。你们对“美国民主”的除魅，是在维护民主的原意，而不是放弃民主的本身，这是一目了然的。在美国，民主有被共和党用商业的“公司法则”和宗教的“福音主义”操控成“反向极权主义”，进而有滑向列宁主义的危险，被你们尖锐地指出来。左翼，毕竟是可爱的知识分子，最终都是普世价值的守护者，而不是单单的美国民主政治的攻击者。

20年来，大洋两岸，天各一方，不同的风雨来袭，我们在中国和美国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同。令人诧异的是，这么多年，我们之间曾经一致的基本理念，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读你的《知识人的黄昏》，更感到这一点。坦白地说，曾有一个担心，担心你在美国工作改行，陷在公司政治中，思考问题会受到局限，

变成一位不断抱怨的普通白领。现在知道，这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阅读和思考超拔了你的精神。在美国，你的灵魂是自由的。不单是未竟的学术理想支撑了你的阅读，更是对人类命运的热烈关注引导着你的思考。你的“重新阅读雷蒙·阿隆”，我也是很喜欢，几次阅读阿隆后的感觉，都和你非常接近。20世纪80年代，萨特是我们年轻时最为中意的法国思想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感染了整整一代人。那时候，虽然知道，但却没有很好地平衡萨特曾经对苏联等极权体制有过不当的赞美，部分原因是对他的思想对手雷蒙·阿隆不甚了解。和你一样，我是后来才读到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还有严博非兄前几年在新星出版社推出的《雷蒙·阿隆回忆录》。读过以后，深感像阿隆这样看似稍右，当初就抵制萨特借用苏式体制来批判“美国民主”的思想家，才是走在历史的中道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阿隆的思想，属于那种逆水行舟的独行者的识见。”在当今中国，“左”、“右”言论都过甚其词，许多学者仍在“宁左毋右”的潮流中，敢于纠偏的“中道”，才是难能可贵的，不是吗？

傅铿，读你的《知识人的黄昏》，是一次触动，触动了20年前的那些记忆。那时候，上海知识界很多人离去，都是从很好的位置上出国去。我们一起读书7年的同专业室友，你都认识的，都是学得很好的一批人。毕业以后，X从上海大学，P从社科院，都去了美国中西部，也改行到了IT行业。我初访旧金山，也曾被认为不会再回来。确实是，20世纪90年代离去的那一代知识人，大都一去不复返。我当然是指精神上的“复返”，回来探亲的不算。看到今天中国的思想界的困顿，学术界的混乱，大学、研究院里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无从解决，我常常想到，你们的离开，

也不枉然；一去不复返，更是自然。当然，如果你们这一批人仍然留在上海，我们之间的“小环境”会好一些，今日所谓的“海派文化”或许还能多撑住一些。如今要说 20 年的发展，学术的空间固然渐渐撬开，但是思想的空间，却仍然疙疙瘩瘩，磕磕绊绊。为求新知，为获新解，我们这些人仍然需要精神上的“流放”。难能可贵的是，你却带着你的思想作品，回到我们中间。虽然不是海外那些“专业分子”的高头讲章，但你的阅历和思考，诚挚而深沉，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流放者归来”。

自序

美梦醒来日已中

现在我已说不清楚，当时自己负笈西渡太平洋的时候，心中到底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望，或者说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梦。朦胧的感觉是要实现一种更美好的生活。应该说，当时我拿到一份纽约上州一所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时，心中不无喜悦。这毕竟也代表了自己在国内奋斗多年的成果，尽管放弃的是一个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的职位、一星期只需在办公室坐谈两个半天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想当年自己曾是一个卖文为生者。90年代初曾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六四”前后中国内地知识人的激进思想进行了反思。同时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台湾的《时报周刊》等刊物上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记得当年在《时报周刊》上发表的一篇讨论大陆知识人的文章，区区5000字我便拿到了150美元的稿酬。此外我还翻译过一些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名著，并写过这方面的专著。

在飞越太平洋时，我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之后在美国的12个春秋里，自己竟然再没有正式发表过一篇文章，当然也不知道自己

竟会一去不归。刚到美国的艰辛，是每个中国学子皆有的，这里无须多说。想当年过五关、斩六将，历尽九九八十一难，就是为了在西土实现一个三位一体的梦：学位、身份和一份体面的工作。

一个高等学位，是来美国堂而皇之的理由和目标。奈何我在国内学的是文科，到美国读的是文化人类学。一个春秋寒暑之后，我渐渐意识到，要凭这个文化人类学博士在美国取得一个身份，即使不比登天还难，恐怕也不是我这等闲之辈所能做到的。我在国内时曾研究过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许琅光，知道他所著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一书以及其他文化理论成果，使他成为20世纪第一个在美国西北大学被聘为教授的华裔学者；我当时的文化人类学导师亦曾师从他。但是，我为之当研究生助理的那位讲师，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白人博士，竟在任教一个学期之后即失了业；而一个助理教授之位，竟有一百多人竞争。于是我衡己度时，便偷偷地去修了一些电脑硕士的课程。等到系里发觉，我已修完了五六门电脑课程。人类学系毫不留情地砍断了我的奖学金。尽管此时我已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要取得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的道路却迢迢何其远。于是横下心，打工挣钱，自费读完这个电脑硕士。

一个学期之后，正逢美国网络经济勃发之初，我做梦也没想到尚未毕业即拿到了第一份电脑工作。三位一体的美国梦中，工作竟是第一个实现。又一个寒暑过后，电脑硕士的学位亦垂手而得。下一个目标便盯着永久居留身份（绿卡）了。可好事总是多磨的。就在我儿子呱呱落地的第二天，美国独立日的长周末前，这全家人赖以谋生的工作竟给丢了。

我没有为此感到悲哀，反而有某种意义上的轻松，因为此前

已有辞去这工作的念头。天无绝人之路，领了三个星期的失业金后，我便举家南迁，应聘于一个当时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接下来所有的精力便聚集在这身份问题上了。为了减轻身份压力，我们此前申请了加拿大绿卡。大约在南迁后半年，这加拿大绿卡便批下来了。经过反复权衡之后，我们还是放弃了它。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又经历了三年多的磨难，我们才等到了这张美国绿卡。过来的人都知道，办美国绿卡最重要的因素是你的运气——恰好的时机。撇开“六四”绿卡不谈，这移民局、劳工局办事的效率和游戏规则，完全受一些非你所能预测的因素所左右。为这绿卡，我虽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和焦烦之日，但比较“9·11”之后的申办者来，我不得不暗自庆幸。

一卡在手，便可玩儿跳槽的游戏了。在90年代后期网络经济的大浪潮中，吾等无名小辈眼睁睁地看着诸多弄潮儿，如雅虎的杨致远和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左思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致富速度之快，有如神话。现在细想，吾辈虽身处这大潮的边缘，亦是得益者。在短短的三五年间，作为一个电脑工程师，自己已经跻身于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行列。某天一觉醒来，那三位一体的美国梦已然全都实现。

美国人说时间飞走，中国人曰时光如梭。一转眼，又是三个春秋过去了。这期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每天三四小时的通勤和十二小时的工作，实在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工作已变得毫无乐趣可言。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个在国内最反感于“做革命螺丝钉”的人，却彻彻底底地当了一个美国“资本家的螺丝钉”。记得在国内上大学时，读过英国首相丘吉尔写的散文“绘画作为一种消遣”（*Painting as a Pastime*）。丘翁说，天下理性而勤

劳的人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工作和娱乐完全分开的人，另一类是把工作和娱乐当成一回事的人。不幸的是，第一类人占了绝大多数。对他们来说，长时间地工作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烦琐枯燥无味的工作不仅给他们带来酬金，还带来寻找乐趣的强烈欲望。“但是，命运之神的宠儿是第二类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自然的和谐。对他们来说，工作时间总不会太长，每日都是假日。而真正的假日到来时，他们反而会抱怨这假日强制打断了他们埋头从事的工作。”

不知怎么的，我愈来愈感觉到，我已从在国内时的“命运之神的宠儿”，沦落到把工作仅仅视作谋生手段的“打工仔”。对工作不再有热情，职业之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再混十年恐怕还是在原地打转。难道这就是我来美国的初衷吗？难道这就是我所有的美国梦吗？

早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仿佛又重新陷入人生之路上的诸多迷惑和诱惑。先是不断听到和亲眼看到有许多朋友“海归”了。一位在同一美国大学的校友，出国时读的是政治学博士，后来多少受了我转学电脑的启发，在我找到工作后不久，也读了电脑硕士。毕业后很快在华尔街谋到了职位，几年工夫年薪涨到了十几万，并升了 V.P.，读完了 MBA。2001 年此君冒着离婚的风险，毅然辞职，到北京当了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虽然薪永远不能同美国的相比，但职业生活和业余生活则丰富多了。

我在国内的一些好友，早已当上大教授，有些还成了博士指导老师。近年来，许多国内朋友到美国访问交流，我偶尔也问起他们回国做事的可能性。但毕竟隔行如隔山；再说走人生的回头路恐怕绝不是一种出路吧。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朋友，至今无

一人是赞同我放弃这里的职业，归国重操旧业的。人生之河勇往直前，人无须，也不应回头看。有苏东坡词为证：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时光倒流——回首告别母国之年

年华似水，19年的时光静悄悄地流走了。回想告别母国那年，我还是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少年气盛，风华正茂。人到中年常常开始追忆往事，有时一人独处独思，好山好水好寂寞，居然时光倒流，翻看了自己出国那一年的日记，追忆逝水年华。如果说人生中真有那么几个转折点的话，那么1992年发生的那些事情便构成了我一生中当时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决定性的急转弯。这里不妨就那一年我参加的一些文人朋友间的文化活动，记一本陈年的忆旧流水账，也算是我出国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心路历程的“回光返照”。

那年1月4日，周五，到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上班，下午回家前同事陈克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那篇论英法知识人的文章刊于《读书》1992年第1期。另外严博非则准备请你在沙龙讲一次‘西方的知识人研究’。”陈说的那篇文章题为“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全文12000字刊于上海社科院1991年第3期《季刊》；《读书》刊登了约原文的一半。严博非是社科院哲学所的朋友，他和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的许纪霖以及和平研究所的何平等办了一个小型的沙龙，每个月请一位朋友主讲一个主

题。此前1991年夏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译的《论传统》一书，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于同年出版了我翻译的《自由主义》一书。严博非后来成了上海季风书店的董事长。此是后话。

3月18日，周三，晚上7点半许纪霖来电话，说北京《读书》杂志编辑赵丽雅来组稿，星期五9点半约请部分作者在文汇报大楼21楼座谈，问我是否想去。我说那太好了。许并告我最好带文章去，至少带一个选题去。结果次日我一口气便写成了一篇6000多字的“现代文化中的野性思维——杰姆逊的文化批评断想”一文。杰姆逊是美国杜克大学著名后现代文化的评论家，当时我刚为台湾桂冠图书公司译完他的《政治无意识》（25万字）。遗憾的是，我出国后无暇顾及文人的好事，后来桂冠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杰姆逊的那本书始终未能出版。3月20日，周五，约9点出发冒雨骑自行车赶到虎丘路50号文汇报大楼。陈克艰、严博非、何平和许纪霖等也陆续赶到。当时赵丽雅约35岁，一口清脆、慢条斯理的京语。认识后她说她们三位女编辑（指她、吴彬和贾宝兰——沈昌文的三位女将）都将《读书》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而且她也不太关心政治，不听广播，不看报，不看电视，也不懂到商店购物。中午到四川路北京路的一家餐厅就餐，何平本来要买埋单，赵丽雅硬是付了餐费。

3月25日，周三，约11点严博非来电话，约我明天到他家会面香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林道群。次日，约10点45分坐车到严博非斜土路寓所。前来聚会的人计有许纪霖、陈克艰、萧功秦、何平、朱伟（《文化读书周报》编辑）、李新华、包亚明、孔令琴以及主客林道群。当时林道群年仅二十几岁的样子，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他先从《论传统》及《读书》上的文章知道了我，

向严博非提出要见我。他来面见大家的主要目的也是组稿。席间何平、李新华等对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都提出了批评，而我却竭力为他讲了一通好话。许纪霖送每人一册他的专著《智者的尊严》。许为人相当稳重，不同别人争论，也不挖苦、调侃别人，而大都是颇有灵气地陈述自己的主张。

3月27日，周五，与许纪霖通电话，他要我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写有关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评论文章。因为当时就余英时和姜义华（复旦历史系教授）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的争论，金观涛和刘青峰主持的《二十一世纪》打算展开更多的讨论。于是我翻读了哈耶克的《自由的宪章》、托克维尔的《旧体制与法国革命》以及爱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反思录》，写成了一篇5000字的“中国知识人的激进主义神话”一文，后由刘青峰刊于《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3期。

1992年5月正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派思想家哈耶克仙逝，我又为《二十一世纪》写了一篇围绕《自由的宪章》一书展开的哈耶克自由派思想的述评，作为纪念；后来全文1万多字刊于《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6期。7月8日晚上到上海市西边梅陇镇的许纪霖家里做客，会晤北京来的顾昕先生（也是顾昕看了我《读书》上的文章，点名要见我），严博非、何平等亦来。由于我住市东边的大杨浦区，当时单程得2个多小时，于是晚上便住在许家。晚上谈到1点过后，兴奋难眠，看到纪霖的书架上有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台湾出版的新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竟读得爱不释手。第二天与纪霖兄说起此书，他说是台湾的出版社寄给他托他写书评的，并大度地说：“你要看就拿去，但你要为它写一篇书评。”闻此言，我可谓欣喜若狂。后来我真的为此